



李白青壮年时期“月”意象的自我深化

**Li Bai's Deepening of the Imagery of the "Moon" during His Youth
and Middle Age**

谢文卉

Tiah Ven Wei

23ALB00922

指导老师：余曆雄 博士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毕业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MENT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April 2026



李白青壮年时期“月”意象的自我深化

**Li Bai's Deepening of the Imagery of the "Moon" during His Youth
and Middle Age**

谢文卉

Tiah Ven Wei

23ALB00922

指导老师：余曆雄 博士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毕业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MENT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April 2026

Copyright Statement

©2026 Tiah Ven Wei.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final year project report is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Chinese Studies at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UTAR). This final year project report represents the work of the author, except where due acknowledgment has been made in the text. No part of this final year project report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hether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author or UTAR, in accordance with UTAR's Intellectual Property Policy.

目次

宣誓	i
摘要	ii
致谢	iii
第一章 绪言	1
第一节 研究动机.....	2
第二节 当前研究情况.....	3
第三节 论文构思.....	5
第四节 研究难题.....	6
第二章 李白的经历与时代背景	8
第一节 李白的个人经历.....	8
第二节 盛唐前中期下的李白.....	11
第三章 理想投射中的“月”	14
第一节 前景未知中的天真之月.....	14
第二节 理想可及中的乐观之月.....	17
第四章 现实体认中的“月”	20
第一节 虚实落差中的叹息之月.....	20
第二节 孤寂苍凉中的沉思之月.....	23
第五章 结语	27
参考文献	30

宣誓

谨此宣誓：此毕业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电子或口述资料，皆已注明具体出处，并详列相关参考书目。

姓名：谢文卉 TIAH VEN WEI

学号：23ALB00922

日期：2026年4月24日

摘要

本文以李白诗歌中的“月”意象为核心，聚焦其青壮年时期，探讨该意象的自我深化过程与诗人自我意识的关联，旨在解决以下问题：在青壮年阶段内，“月”意象如何随诗人不同的人生处境呈现层次性深化；以及这种深化如何反映其自我意识的丰富与调适。通过梳理李白青壮年的生平与时代背景，重点分析“月”如何从自然景象逐渐演化为诗人表达自我、追寻理想、应对现实困境的精神符号，以克服学界以往研究对“月”意象偏重客体形式的静态研究、缺乏与诗人生命历程动态关联的不足。

与长时段“流变”研究不同，本文不强调阶段之间的断裂式转变，而关注青壮年同一生命段落内部月意象的累积性深化。笔者将李白青壮年历程按精神处境分为四个面向：前景未知中的天真之月、理想可及中的乐观之月、虚实落差中的叹息之月、孤寂苍凉中的沉思之月。这些面向并非线性替代关系，而是同一主体在不同处境下的情感深度的逐层推进。后者以前者为底色，在困境中发展为更复杂的自我书写。这一意象的深化过程，既折射出李白个人情感的丰富与自我认知的深入，也展现他在理想与现实矛盾中的精神调适能力。诗中的“月”始终带有鲜明的“有我”色彩，是主客交融、心物合一的艺术表现，呈现其济世抱负与独立不羁的人格，并在现实的冲击与挣扎中逐渐深化对自我的书写与认同。

本文结合文本分析与时代背景，采用文献研究、文本细读与社会—历史批评分析法，勾勒青壮年时期“月”意象的深化轨迹，阐释其在自我表达与精神建构中的价值，分析其与时代精神的关系，以期为理解李白诗歌的深层内涵与中国古典诗歌中的自我书写传统提供新的视角。

【关键词】李白；月；唐代；意象深化；自我书写；青壮年时期

致谢

时光匆匆，三年转瞬即逝。

站在毕业的门槛上回望，心里没有太多波澜，也没有特别的期待。这与 2023 年刚入学时的自己，已是两个人。那时的我发誓要好好学习，要掌握自己的命运，要拼出一个更好的未来。我拼命卷自己，也卷别人，对自己的要求高到连自己都害怕。同学们渐渐疏远了我，我也不在意。我想的是，比起同龄的朋友，我已经落后了三年，必须追回来。可我太专注自己，却忘了每个人的起跑线并不相同。我的同学大多小我三四岁，我们本就不在同一个赛道上。

这三年，为了平衡工作与学业，我几乎没有社交和娱乐。每天两点一线，赚取生活费，完成学业。即便熬到凌晨三四点，每晚心悸入睡，我也甘之如饴。记得考试期间，为了背完所有知识点，我只睡了半个小时便爬起来奔赴考场，还以咖啡提神，身体根本经受不住。白天精神难以集中，时常打瞌睡。但回望这三年，除了写论文、赶作业时的煎熬，其实更多的感受是快乐与自足。我很享受且珍惜在拉曼大学上课、学习的日子，享受知识不断地涌入大脑。考试固然磨人，但我偏向喜欢它。因为它是一套验证系统，让我知道自己学到了哪里。

而实习之后，心态变了。那三个月让我明白，那样的生活就是以后每一天的生活。身上有了“班味”，我开始不断质疑：此前那么拼命，究竟为了什么？或许是为了确保绩点在 3.0 以上，甚至冲得更高，以保住奖学金，也为了毕业后能获得国家贷学金（PTPTN）的豁免资格。但最后一个学期来了，我不必再拼绩点了，下学期就毕业，冲得再高也没有意义；国家也取消了私立大学豁免贷学金的资格。那我这么努力是为了

什么？为了毕业吗？如果只是为了毕业，论文应付过去就行了，何必这么拼？死磕一个论点，除了让自己煎熬，还有什么意义？

直到我的毕业论文导师余曆雄老师说：“试试看吧。”他说他在我身上看到了值得一试的可能。我自问从来没有学术天赋，也从来没有人对我抱过希望，我自己也从不抱什么希望。可忽然有一个人对我有所期待，愿意给我机会一试，只因为我值得。我也想回馈这份信任，因为它值得。我的奖学金担保人静倩，愿意为我担保，也是因为觉得我值得。唯一在大学里面为数不多的好朋友楷滢，愿意不厌其烦地给我分享学习心得、笔记、作业以及备考资料，也是因为我值得。

为了回馈这份“值得”，我尝试把这篇论文做到尽善尽美。虽然最终仍有不足，但我尽力了。这三年，我有矛盾、有挣扎、有要求。前两年也是有过热血的，只是到了最后一年，那股劲不知什么时候就散了。我怕辜负他们，更怕辜负过去的自己，不能因为没看到未来的希望，就轻易放弃。这篇论文，便是在这样的挣扎中完成的。没什么值得开心的。毕业以后的日子大概也没什么新意，无非是教书、教书。但或许我还会继续读硕士，至少现在我是想的。不是为了学术，只是因为喜欢学习本身。

感谢所有觉得我值得信任的人。感谢余曆雄老师，感谢您的指导和机会；感谢静倩，感谢你的担保；感谢好友楷滢，谢谢你不厌其烦地给我建议和帮助；感谢美虹姐；感谢我的屋主；感谢我的家人；也感谢金宝这个充满温情的地方。我没有太多同窗好友，便也不必郑重地说再见和纪念了。

就这样吧。

第一章 绪言

“月”意象是中国文学中一个亘古不变的母题,《诗经·陈风·月出》率先开启“以月喻人”与“借月抒情”的书写传统¹,后世对“月”的吟咏便绵延不绝。至唐代,诗歌创作高度兴起,臻于鼎盛,“月”的书写必然进入了更丰富的阶段。作为唐代杰出诗人代表,李白写“月”的诗歌占比约近四成²。不仅数量可观,更在艺术手法与情感投射上达到新的高度。他跌宕起伏的人生更让笔下的“月”承载了强烈的主观色彩与自我意识,其人格与情怀亦于此得到充分表现。

李白诗歌中既有宏阔抱负的呼告,也有漂泊失意时的沉吟,乃至贯通古今的感悟等。在这些诗作中,“月”或多或少是其抒怀言志的重要媒介与对话对象。由此观之,即便身处落魄困顿之际,李白依然展现出积极求索生命意义的不懈姿态,其诗字里行间跃动的,正是这样一种向上且强韧蓬勃的生命力音符。更进一步看,李白更实现了重要的范式突破,使“月”超越客观景物,升华为承载诗人情感与人格的、“有我之境”的艺术表达。正因如此,“月”这一传统意象被赋予了崭新的审美内涵和主体深度。

近年来,学界倾向于将李白笔下的“月”作为一类稳定的诗歌形象进行归纳与描述,而较少关注“月”意象在不同处境、不同心境下的差异性与动态变化,更缺乏对青壮年这一关键阶段内部月意象层次性深化的专门考察。基于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聚焦李白青壮年时期,梳理其“月”意象在不同精神处境下的多元面向,探讨该意象如何从天真、乐观向叹息、沉思逐层深化,进而揭示这一深化过程与诗人自我意识演进之间的内在关联,以期为理解李白诗歌的深层内涵与中国古典诗歌中的自我书写传统提供新的视角。

¹ 王强,〈中国古代诗歌中的月意象〉,《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页65。

² 曹化根,〈李白的明月世界〉,郁贤皓主编,《中国李白研究》2001-2002年集(合肥:黄山书社,2002),页308。

第一节 研究动机

李白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伟大诗人，其诗中的“月”意象不仅是一个恒定的美学符号，更是映射诗人生命历程与意识演变的独特载体。然而，长期以来，学界中对李白“月”意象的研究多集中于象征意义的解读与归纳，较少关注同一生命阶段内部月意象因处境不同而产生的层次性差异，也未能充分阐释月意象如何参与并深化诗人的自我书写。因此，对李白青壮年时期“月”意象的自我深化过程进行系统考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李白以诗中强烈的情感表达与磅礴的自我意识而被赋予“承先启后”的文学史地位³，那么，这一成就究竟是通过怎样的意象构建来实现？为回应这一命题，本文遂以“月”意象为核心线索，聚焦李白青壮年这一关键阶段，系统考察其意象的深化过程与诗人自我意识发展之间的关联，以期突破传统研究对意象的静态化解读，为李白诗歌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对李白自身而言，“月”意象的自我深化与其在青壮年时期的自我认知、生命体验和精神追求息息相关。“月”不仅见证了个体情感的变化，更成为诗人建构自我、表达理想、调适精神的重要媒介。将文本细读与社会—历史分析结合，以解读这一深化过程，是对李白青壮年精神世界的重探，有助于打破关于其“浪漫”、“狂放不羁”的刻板认知，还原其主体意识的多层次与复杂性。

对于唐代诗歌发展而言，如前文所提及，李白对“月”意象的艺术开拓具有“承先启后”的作用。他继承了“月”意象的传统抒情方式，同时又以其强烈的个性化表达，将“月”提炼成一种承载盛唐气象、体现时代精神的文化符号。值得注意的是，李白对月意象的创造性开拓，在其青壮年时期已经奠定了基本格局。天真之月、乐观

³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新著》（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页478。

之月、叹息之月、沉思之月等多元面向均在这一阶段完成。因此，本研究虽聚焦青壮年，亦有助于揭示唐代诗歌与时代精神之间的互动关系。

于后世诗歌而言，李白开创了“月我交融”的书写范式，使“月”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主体性和情感深度，成为开风气之先的意象⁴。自杜甫、李商隐，下及苏轼、辛弃疾、陆游乃至元明清文人，都以李白为重要参照，并在不同程度上继承了这一传统，用“月”以表达自我、寄托情怀、构筑诗歌境界。为此，此分析也利于把握文人抒情传统的内在脉络。

从当代及现代诗歌创作的视角来看，李白对“月”意象高度个性化的书写与自我精神的交融，具有跨时代的启示意义。在古典意象易陷于审美固化，且时代受众认知与偏好不断变化的背景下，如何实现其现代转化与融合，始终是重要的诗学命题，⁵而李白这一书写恰好为此提供了参照。

通过对此深入剖析，力图推动李白研究的深化，也为理解中国诗歌自我书写的传统及其现代转化提供新的视角。

第二节 当前研究情况

本论文研究主要围绕三个维度展开，分别为李白研究、李白与唐代关系研究、李白“月”意象与自我书写研究。在此基础上，最终进行整体性的综合探讨。

关于李白研究，本论文主要参考安旗所著的《李白研究》，并辅以李长之所著的《李白传》。这些论著为理解李白的生平轨迹、创作分期及精神世界提供了扎实的传记基础与多维的学术视角，成为本文把握诗人主体发展的文献依托。

⁴ 李丹丹，〈李白的悲剧人生及诗的明月意象思维特点〉，《贺州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页48。

⁵ 陈燕，〈文学鉴赏中传统诗词意象的现代性转化与接受研究〉，《青年文学家》2025年第30期，页105。

其次是李白与唐代关系研究，相关文献如袁行霈《李白诗歌与盛唐文化》、葛景春《李白诗歌与唐代文化精神》以及李洲良《盛唐时代与李白的浪漫主义精神》，以宏观的唐代风貌为背景，深入阐释李白诗风的形成与艺术特质，为了解李白与时代互动关系提供了历史与文化语境的参照。陈翔进一步指出，李白并非被动反映士风，而是“以自身个性将开元士风典型化，并推动盛唐气象的形成”⁶。这一观点为本研究提供了关键的理论视角，即聚焦于诗人高度个人化的“月”意象创造与精神投射，以期揭示其主动参与并塑造时代审美与精神气象的内在依据。

在现有研究中，将李白“月”意象与其自我书写相结合的探讨则尚显不足。目前可查的相关专题研究仅有庞维跃与陈俊文所作，其从“‘月’意象作为自我意识载体”的视角切入，并以李白诗中的“月”意象为线索，梳理了诗人不同生命阶段中“月”所承载的情感内涵与人格投射，初步揭示了诗人自我意识从外在理想追寻到内在精神超越的演变过程。然而，该研究仍有深化空间，如其分析偏重线性描述，按青年、壮年、暮年等生命阶段依次展开，分别归纳各阶段李白写“月”的特征，而未能在同一阶段内部形成多重处境的比较与互文，亦未追踪“月”意象本身在不同处境下的具体变化过程，导致“月”意象的层次性差异以及与自我形象的动态关联未能充分彰显；其理论依托也偏向“寄情移景”、“借景抒情”的传统阐释路径，未能进一步分析李白如何通过“月”意象的个性化重构，凸显其强烈的个人色彩。鉴于此，本文聚焦青壮年这一特定时期，考察月意象在同一生命段落内部因处境不同而产生的自我深化过程。笔者将进一步拓宽考察维度，将李白“月”意象与自我书写置于唐代文学与文化发展的整体脉络中加以审视，以期更立体地把握二者的动态关系。

基于当前研究的现状，笔者将文献梳理工作分为两大类：

⁶ 陈翔，《试论李白开元年间思想与开元士风——兼证李白生平和诗歌中的若干问题》（北京：首都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3），页22。

第一类为李白“月”的意象研究，刘飞指出“月”与酒共同映照出李白游离的人生状态⁷；龙新辉则表示“月”参与了李白精神家园的建构与主体意识的回归，二者共同塑造了诗人独特的生命历程⁸；安相更强调李白的个性本身使“月”必然成为其精神象征⁹。这些研究固然为“月”的意象功能提供了系统性参照，但大多分析仍将“月”置于客体位置，未能充分揭示“月”意象如何作为一种能动的诗学媒介，主动参与并推动李白自我意识的建构与深化。

第二类为李白的自我形象研究。贾佳对李白自我人格及其象征意象的梳理，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的互文参照。他指出，李白具有一种深刻的明月情结，而面对“月”时，其心灵并非封闭于自我，而是向天地精神无拘无束地敞开。¹⁰这一观点揭示了“月”如何让李白释放真我，有助于理解诗人“月我交融”的独特境界。此外，宋玮〈李白诗歌中的自我形象和人格魅力〉、鲁小兰〈李白诗歌中自我形象及其演变〉、荣慧华〈别有天地非人间——李白诗歌中的自我形象〉等，亦从不同视角对李白自我形象进行阐释，为本文把握其思想与形象的动态演变提供了多维参照。

上述研究各有其独到之处，共同拓宽了笔者本次研究的解读视域。

第三节 论文构思

首先，本文将采用文献研究法，指的是检索、搜集、甄别、整理、分析相关文献资料，从而对研究对象形成客观认识的研究方法。¹¹通过系统梳理李白与其诗歌、“月”意象、自我书写及唐代背景相关的学术文献，辨析“月”意象研究与自我书写研究之

⁷ 刘飞，〈明月与酒：李白人生定位的困惑〉，《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页114。

⁸ 龙新辉，〈李白写“月”诗歌的精神意涵〉，《湖南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页213。

⁹ 安相，〈论李白诗歌中月意象的精神内涵〉，《晋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页80。

¹⁰ 贾佳，〈心何以安——论李白的人格精神〉（郑州：河南大学硕士论文，2009），页25。

¹¹ 杜晓利，〈富有生命力的文献研究法〉，《上海教育科研》2013年第10期，页1。

间尚未充分融合的理论空间，从而确立本研究的核心问题与论述方向。在整合现有研究成果的同时，本文也将考察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争鸣，进而确立自身理论的立足点。

其次是文本细读法，其作为一种专注于文本自身并深入解读与分析的方法，旨在通过分析意图、感觉、语气与意义的四要素对文本进行“目的式”细读¹²。通过对李白有关“月”意象的诗作进行反复、细致的语言分析与结构解读，不仅关注“月”的意象内涵、修辞方式与情感色彩，更着重考察其在具体诗境中的功能。同时，聚焦李白在青壮年阶段的“月”意象与诗人的自我投射、精神对话与身份建构，揭示“月”意象深化与自我书写的关系。

最后，社会—历史分析法作为立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视角，对文学现象进行观察、分析与评价的批评方法，¹³推动本研究将李白的诗歌创作置于盛唐前中期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加以考察。通过结合唐代的政治变迁、士人精神、审美风尚及哲学思潮，分析“月”意象的深化如何呼应诗人青壮年阶段的生命历程，并折射出盛唐时代精神中理想与现实的张力，能有效避免对意象做孤立、静态的解读。

通过上述方法的综合运用，构建一个从文本、主体到时代的分析框架，能有效探讨李白诗中“月”的意象深化与其自我书写之间的关联。

第四节 研究难题

本文将意象研究与自我书写进行整合研究的尝试，不可避免地面对方法上的难题。根本在于，如何将“月”意象的层次性深化分析与自我意识的书写达到内在贯通，以避免将二者进行简单拼接，同时防止对文本的过度阐释，是本研究需谨慎把握与处理的课题。此外，既有研究对李白诗歌中“月”意象的整理与归纳已相当详尽，如何在

¹² 崔国清，〈文本细读实践起源与范式演进〉，《中国文学批评》2024年第3期，页133。

¹³ 王先霭主编，《文学批评原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页69。

已有成果基础上避免重复性描述、聚焦于青壮年阶段内部深化这一特定角度以形成论述的集中性与创新性，亦是本研究需要直面的难题。其次，将“月”置于“能动性”与“建构性”的框架上研究，其操作亦远比“象征性”的描述更难。这一要求不仅需要辨析“月”意象在青壮年阶段内从天真、乐观向叹息、沉思的功能递进，更需对照其与诗人同一生命段落内部不同处境之间的关联。由于诗歌文本本身就具备多义性，加之史料的存在局限，时代背景的影响往往呈间接形态，本研究须在文本、个体与历史三者之间保持平衡，避免陷入过度诠释或简单对应的偏颇。

尽管存在上述挑战，本研究仍期望通过系统探讨，实现几个方面的预期成果。在“月”意象的阐释上，本文力图超越以往学界对“月”的静态化解读，通过追踪其在诗人青壮年阶段不同精神处境下的功能深化，解释“月”如何作为一种能动的诗学媒介，主动并持续参与诗人的自我建构。通过这一梳理，本文希望能有效指出一条聚焦于同一生命段落内部的阐释路径。在自我书写的研究方面，本文将深化对李白自我形象的理解，通过“月”意象的层次性深化具体呈现诗人自我意识的丰富、调适与推进，继而提供一份基于文本与生命历程的实证分析。最后，通过意象、诗人生命历程与时代背景的融合考察，本文期望能为李白研究带来新的视角，并提供一种可参照的整体性分析框架。

第二章 李白的经历与时代背景

本章通过勾勒李白青壮年时期的生命轨迹与盛唐前中期语境的交织脉络，为后续探讨“月”意象的自我深化提供背景依托。其一，李白的青壮年生活经历。首先简述其早年随父移居蜀地并在当地启蒙的经历，探讨其家世教养与生长环境对其思想意识的初步成型；其次，对李白青壮年时期辗转漫游的动机作扼要说明，呈现其从“理想可及”到“求索无门”的现实处境转换。其二，李白所处的唐代背景之关系。一方面，说明开元盛世的感召如何激发李白建功立业的抱负，使之产生“天真之月”与“乐观之月”；另一方面，阐述天宝年间政治生态的微妙变化如何对李白造成现实冲击，使其从理想坠入失落，进而催生“叹息之月”与“沉思之月”。

第一节 李白的个人经历

李白（701-762）的出生地历来存有争议，陈寅恪在〈李太白氏族之疑问〉中指出**“自西域迁居蜀汉之时，其年至少已五岁矣。是太白生于西域，不生于中国也”**¹⁴。由此可知李白并非生于中原，其随父迁居蜀地时仍属幼年。其父被称为“李客”，此“客”字是因中原人以“胡客”称西域来者而得¹⁵。这种自幼的客居境遇，无形中塑造了李白独特的思想意识，日本学者松浦友久称之为“客寓意识”¹⁶。

李白少承家学，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称**“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¹⁷，复于《赠张相镐二首》（其二）中言**“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¹⁸，可见其早年即怀有强烈进取之心。此志向源于光耀门楣、摆脱客居身份之愿，亦深受传统儒道思想这样较

¹⁴ 陈寅恪，〈李太白氏族之疑问〉，《清华学报》1935年第1期，页154。

¹⁵ 陈寅恪，〈李太白氏族之疑问〉，页154。

¹⁶ [日]松浦友久著，刘维治、尚永亮、刘崇德译，《李白的客寓意识及其诗思——李白评传》（北京：中华书局，2001），页1。

¹⁷ [唐]李白著，[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11），页1057-1065。

¹⁸ [唐]李白著，[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页513-515。

为全面的系统教育的长期熏染。而蜀地儒学传统深厚，同时又是道教发源地之一，这种儒道并存的区域文化特征，深刻塑造了李白的思想，为其日后“出世”与“入世”的矛盾心态埋下了伏笔。同时，李白在蜀地不仅读书，亦习剑术、好任侠。他在《与韩荆州书》中自称“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¹⁹；在《赠从兄襄阳少府皓》中亦言“结发未识事，所交尽豪雄”²⁰。这种任侠尚武的精神，与儒家“兼济天下”的理想、道家“逍遥物外”的追求相互交织，共同塑造了李白独特的人格气质。他既渴望建功立业、名垂青史，又向往自由自在、不受羁绊；既相信凭借才华可以“直抵天子”，又不屑于循规蹈矩、参加科举。这种内在的张力，贯穿了李白的一生，也深刻地影响了他笔下的“月”意象。在这一时期，李白的诗作虽存世不多，但已可窥见其天真的端倪。他在《登锦城散花楼》中写“今来一登望，如上九天游”²¹，将登楼的体验与仙游相勾连，全然沉浸在游览的乐趣之中。这种天真，正是蜀中岁月赋予他的精神底色。在一个尚未被现实磨蚀的年纪，他相信世界如月光般澄明，相信理想如月亮般可及，所以可以全然沉浸在美好景色当中。因此，这一时期的经历，促成了他对“天真之月”的书写。此后在青壮年时期，虽然挫折一次次覆盖上来，但这种天真始终是他的底色，从未真正离去。

李白的乐观便表现于开元八年（720），李白二十岁时，他首次走出家门，拜谒时任渝州刺史的李邕。李邕是当时著名的文章家、书法家，以爱才著称。然而，年轻的李白与他见面时在言辞间锋芒毕露的表现令李邕不悦。李白事后写下《上李邕》一诗，中有“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²²之句，既是对自我才华的自信宣告，也是对李邕不识人才的委婉批评。这次干谒虽未成功，却让李白初次体验到仕途的曲折，

¹⁹ [唐]李白著，[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页1054-1057。

²⁰ [唐]李白著，[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页402-403。

²¹ [唐]李白著，[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页825。

²² [唐]李白著，[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页442-443。

也坚定了他以“非常之径”也可以成功信念。此后四年间，他一直漫游求仕，先后游历江陵、洞庭、庐山、金陵、扬州等地，并广交好友。不止如此，他还资助落魄公子，其乐善好施的性格也让自己一度陷入经济困顿。之后他辗转至安陆，经人介绍娶了故宰相许圉师之孙女为妻，定居于安陆寿山。在此期间，他以安陆为基地，频繁外出干谒。开元十八年（730），李白初入长安。然而，长安的生活并不如他想象的那般顺遂。尽管如此，他依旧展现出强烈的上进心，其“乐观之月”的书写，在此已可见端倪。李白虽屡次献诗干谒、奔走求荐，冀望得遇赏识其才的“同路人”，却始终不得援引。

由于他的高度的自信与孤傲，使他未能认清自身定位。虽然他“**有四方之志**”²³，想“**申管晏之谈**”²⁴，常以古代杰出谋士自比；然其本质只是富有才情的诗人，而非具有政治实干的士人，²⁵故而是其所追寻的“同路人”终究只停留于其理想层面。在现实面前，这样一位绝对的理想主义者，注定要承受理想幻灭所带来的精神冲击。不过，随着他在长安诗名大噪，他终于获得了面见天子的机会。然而，好景不长，他原以为即将飞黄腾达，却因权贵进谗而被迫离开长安，这种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促成了他对“叹息之月”书写。此中曲折，后文将详细论述。

离开长安后，李白并未灰心。他先后游历邠州、坊州、嵩山等地，继续干谒地方长吏。开元二十二年（734），他赴襄阳拜谒荆州长史韩朝宗，写下著名的《与韩荆州书》，中有“**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²⁶之句。然而，韩朝宗并未给予他预期的帮助。此后，他又结识了道士元丹丘，二人同隐嵩山，饮酒赋诗，交游甚密。此后的十余年间，李白辗转于大江南北，干谒于权贵之门，却始终未能如愿。他的足迹越走越远，年岁越来越大，诗歌中也渐渐浮现出漂泊与孤寂的情绪。这一时期，已可

²³ 《上安州裴长史书》，参见[唐]李白著，[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页1057-1065。

²⁴ 《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参见[唐]李白著，[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页1038-1044。

²⁵ 王运熙，〈李白的的生活理想和政治理想〉，《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1期，页256。

²⁶ [唐]李白著，[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页1054-1057。

隐约窥见其后“思归之月”的端倪。那种对归宿的渴望，对安定的向往正悄然生长。

然而，早年的天真与乐观并未因此消失，它们只是与叹息、思归层层叠加，共同构成了李白此时复杂的精神世界。

第二节 盛唐前中期下的李白

在探讨唐代对李白青壮年时期的影响时，首先需关注的是盛唐气象对其精神的深刻感召。据袁行霈在《李白诗歌与盛唐文化》中指出，盛唐的政治、经济、文化均达至鼎盛，社会充盈着包容开放、昂扬向上的时代氛围，引领着士人的精神追求。李白亦深受此种盛世氛围影响，在其诗作中展现勃发的创造力。²⁷由此亦可见，李白彼时的理想极为炽烈，他不屑于依循常规科举之途入仕，转而追寻非常之径，冀望遇见真正赏识其才的知音。此种特立独行的选择，本身亦是盛唐精神在其个体生命中的鲜明映照。

开元年间，唐玄宗在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等贤相的辅佐下，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的政策。在政治上，裁汰冗官，整顿吏治，严惩贪腐；在经济上，兴修水利，劝课农桑，轻徭薄赋；在军事上，实行募兵制，巩固边防。据《新唐书·食货志》载，开元时期“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²⁸，这样极低的粮价印证了当时农业生产高度发达、社会安定，百姓生活水平极高。不止如此，天下户口较前代大幅增加，社会经济达到鼎盛。这种物质层面的繁荣，为士人的进取精神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在制度层面，开元时期的选官体系呈现出多元开放的特征。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朝廷对人才的态度极为积极，唐玄宗亦多次下诏求贤。这种自上而下的人才渴求，使士人普遍感到生逢其时、机会可期，更默许了李白以“非常之径”叩问仕途的尝试。这种时代氛围，深刻地塑造了开元士人的精神气质。他们普遍具有

²⁷ 参见袁行霈，《李白诗歌与盛唐文化》，周勋初编，《李白研究》（陈平原主编，《中国学术文存》）（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页241-254。

²⁸ [宋]欧阳修、宋祁等撰，《新唐书》（食货志一）（北京：中华书局，2013），页1346。

强烈的进取心和自信心，相信凭借个人才华可以突破门第、资历的限制。袁行霈指出，李白是盛唐文化孕育出来的天才诗人，其自负、自信与独立人格，充分体现了盛唐士人的时代性格与精神风貌。²⁹这一切，共同促成了他对“天真之月”的书写。

在思想方面，李白在深受儒家入世思想的熏陶思想，也积极吸收道家出世的思想。不仅如此，纵横思想亦影响李白甚远。道教在开元时期得到了广泛传播，唐玄宗本人也极为推崇道教，对道士也多加礼遇。《旧唐书·玄宗本纪》载：“二十一年春正月庚子朔，制令士庶家藏《老子》一本，每年贡举人量减《尚书》、《论语》两条策，加《老子》策，……”³⁰，这表明道教经典已被纳入国家人才选拔体系，成为官方主流意识形态之一。李白虽不参加科举，但这种崇道风气却为他提供了重要的“养望”空间。在道教被推崇的时代，求仙问道、与道士交游成为一种受人尊敬的行为，也为士人积累了重要的社会资本。他出蜀后，先后与司马承祯、吴筠等道士交游，借助道教的社会声望积累人脉与声誉。其中，司马承祯深受玄宗礼遇，被誉为“道兄”，他的赏识使李白备受鼓舞，也更坚定了其以“非常之径”入仕的信念。正是这种信念，支撑着他在干谒一次次失败后仍能保持乐观，也促成了他对“乐观之月”的书写。

然而，盛唐前中期并非只有昂扬的一面。首先，唐玄宗本人的转变是关键。在位日久，玄宗逐渐从早期的励精图治转向怠于政事。他厌倦繁琐的朝政，将政务委托给时任宰相李林甫，自己则沉溺于享乐，这种“高居无为”的态度为李林甫这样的权臣专权打开了方便之门。开元中后期，宰相权力逐渐集中，三省合议制遭到破坏。李林甫利用玄宗的信任，独揽朝政，他排斥异己，屡兴大狱，贬逐张九龄、李适之等名臣。据《旧唐书·李林甫列传》载，李林甫“自处台衡，动循格令，衣冠士子，非常

²⁹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2），页281。

³⁰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玄宗本纪上）（北京：中华书局，2013），页199。

调无仕进之门”³¹。这意味着，除了常规的轮选之外，士人几乎没有其他入仕的途径。

开元时期开放的“非常之径”，至此名存实亡。而玄宗因不再像早年那样励精图治、亲自下诏求贤，而是将选才大权全权交给李林甫，自然默认并沿用了李林甫的那套标准。因此，即使李白因诗名大噪而获得玄宗赏识，玄宗也不会真正将他当作治国之才来任用。李白本以为即将走上坡路，却重重跌了下来。这种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催生了他对“叹息之月”的书写。

天宝年间的边患问题也深刻影响了士人的心态。此时，唐玄宗已怠于政事，对边镇局势日益麻木。安禄山身兼三镇节度使，拥兵十五万，对中原虎视眈眈。朝廷对藩镇的失控，使士人普遍感到忧虑。在北游幽州时，李白目睹边镇军备之盛，不免地对朝中局势感到担忧。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局面下，士人既无法通过正常途径入仕，又看不到国家的未来，普遍陷入彷徨与无力感。于是，对“精神家园”的渴望愈发强烈，也就催生了李白对“沉思之月”的书写。

不过，如前所述，李白在单一阶段中并非只有一种心境。新的情绪不断催生，而原有的心境则沉淀为底色，共同构成了他复杂而完整的精神世界。

³¹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李林甫列传），页199。

第三章 理想投射中的“月”

李白于开元十二年（724）离开蜀地，并于开元十八年（730）初入长安。³²本章即以此为时间参照，聚焦其出蜀后至初入长安这段意气风发的青年时期（23 至 29 岁）。此时的李白，怀抱“济苍生、安社稷”的宏伟抱负，而“月”作为其心中理想的化身，亦映照出此阶段特有的自我形象。这时期的作品便有《渡荆门送别》，其中“月下飞天镜”³³一句，巧妙地将“月”喻为高悬的明镜，映照出诗人彼时澄明如镜、纯粹无染的内心世界，而《峨眉山月歌》中的“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³⁴以动态的“月”与行进的诗人视角相呼应³⁵，展现出其追寻理想的主动姿态。³⁶这两类书写，分别对应了青年李白自我投射的两种基本形态。

第一节 前景未知中的天真之月

本节虽聚焦青年时期，却可借其后期诗作《古朗月行》（节选）中的童年回望，来映照此种精神起点的性质。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仙人垂两足，桂树何团团。

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³⁷

“小时不识月”透露出孩童般未经世事的天真，以及对美好事物的本能向往。“呼作白玉盘”，以日常、亲切的朴素比喻描绘“月”的形状，既显其纯真质朴，亦折射出青年李白未泯的童心与清澈的灵魂底色。接着，“又疑瑶台镜”从“不识”递进为“疑”，喻体亦由“白玉盘”这等凡间器物升华为“瑶台镜”这一仙境宝器，进一步

³² 参见安旗著，《李白研究》（北京：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页 37-38。

³³ [唐]李白著，[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页 631。

³⁴ [唐]李白著，[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页 384-386。

³⁵ 参见萧涤非等撰，《唐诗鉴赏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页 275-276。

³⁶ 参见萧涤非等撰，《唐诗鉴赏词典》，页 302-303。

³⁷ [唐]李白著，[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页 227-228。

表现了他将“月”视为澄明透彻的意象，同时映衬出诗人内心如镜的明亮与纯粹性质。

“飞在青云端”以一“飞”字，展现了动态的拟物手法，将“月”化静为动，宛若顿生凌云之势。“月”在此成为高悬的崇高理想，吸引他去追寻、去仰望，甚至渴望抵达，这恰是李白昂扬奋发、向上追攀的生命姿态之诗化外显。《把酒问月》中“人攀明月不可得”³⁸的“攀月”与《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中“欲上青天览明月”³⁹的“揽月”，皆流露出李白早期对“月”那种无限趋近的强烈渴求。

“仙人垂两足，桂树何团团。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数句，更将“月”描摹为一个静谧和梦幻的神话园林。其中，有仙姿的悠然、桂影的婆娑，也有玉兔捣药的玄妙，营造出一个完整且自足的神话叙事空间。他不仅是引用典故，更是以诗笔作为“镜头”带领读者沉浸式游览这个月宫仙境。这种充盈神话色彩的描绘，不仅映照出他理想化的人格底色，更透露出其对未知世界那份狂热的好奇与想象。彼时的“月”，尚未负载乡愁、孤高与哲思，而仅是一轮皎洁澄净的月亮，恰如李白早年那份亟待施展的赤诚抱负。“月”是为其天真理想的诗化载体，内蕴于心，只待外化实现。这般精神气质，正体现于他频繁干谒地方大员的行动中。早在出蜀之前，李白便已开始其干谒之旅。开元八年（720），李白拜谒时任渝州刺史李邕，写下《上李邕》一诗，诗中“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⁴⁰的壮语，正展露其天真不凡、锋芒毕露的自我期许。

然而，李白天真之月的生成，并非纯然出于个人心性，而是与开元前期的社会文化土壤密切相关。开元元年（713）至开元十一年（723）间，玄宗先后任用姚崇、宋璟为相。二人以务实与刚正著称，整顿吏治、拓宽才路，使开元初年成为唐代士人上

³⁸ [唐]李白著，[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页802-803。

³⁹ [唐]李白著，[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页737-738。

⁴⁰ [唐]李白著，[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页442-443。

升通道最为畅通的时期之一。此种政治氛围，恰成为了李白“天真之月”得以滋生的沃土。更重要的是，此时的人才选拔制度呈现出罕见的开放性。据《新唐书·选举志》载：“其天子自诏者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焉”⁴¹，意即除常规科举外，皇帝亦亲自下诏设科，以选拔特殊人才。在此制度下，献赋、献诗、干谒、隐逸受召等“非常之径”亦被默许甚至鼓励，成为士人入仕的重要补充。朝廷多次下诏求贤，明确要求“唯才是举，不问出身”。这种制度性的开放，使像李白这样不愿循规蹈矩的士人看到了希望。他们相信，凭借真才实学与恰当的自我展示，便可越过漫长的科举阶梯，直达天子之前。与此同时，道教在开元初期获得朝廷推崇，司马承祯、吴筠等道士深受玄宗礼遇。

当然，时代的开放只是提供了外部条件，李白个体的精神世界并非因此变得单一。恰恰是这种开放多元的时代氛围，使他同时接纳了儒家的入世抱负与道家的出世情怀，二者在他的内心形成了一种复杂的张力。⁴²他自幼受儒家思想熏陶，数次拜谒，矢志建功立业；但身处开元盛世，诸家思想并流，亦必然对他产生深刻影响。他本人崇尚自由，故除儒家之外，亦广泛接触道家思想。在二十岁以前，他便已开始求仙问道。然此举并非消极避世，而只是作为养望待举之手段，为政途打开出路。⁴³他“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⁴⁴的经历，正是此种时代风气的个体映现。天真之月的书写，正是这种时代思潮在青年李白心灵中的诗意沉淀。

在此阶段，天真之月成为了他个人理想的诗化表达。李白将对未来的全部憧憬与自信，赤诚地投射于这轮明月之上，“月”是他触手可及的理想彼岸。这种纯粹的、

⁴¹ [宋]欧阳修、宋祁等撰，《新唐书》（选举志上），页1159。

⁴² 杨海波著，〈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李白思想的复杂性〉，《李白思想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页219-242。

⁴³ 杨海波著，〈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李白思想的复杂性〉，页222。

⁴⁴ 《感兴八首》其五，参见[唐]李白著，[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页940。

未经现实磨损的想象，恰恰折射出开元盛世青年士人面对未知前途时特有的乐观主义心理。本节旨在说明，青年李白自我书写中那份看似“狂傲”的自信，底色实为一种对理想世界笃信不疑的天真精神。此天真并非幼稚，而是尚未被现实磨蚀的、对生命可能性的热烈追寻。这种可能性充满诱惑，恰如青年眼中那幅触手可及的理想图景，不断激励他前行并积极创造。

第二节 理想可及中的乐观之月

本节以李白于开元十八年（730）初入长安时所作的《登太白峰》为例，阐释其所突显的高度昂扬的主体精神。

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愿乘冷风去，直出浮云间。

举手可近月，前行若无山。一别武功去，何时复更还？⁴⁵

“西上太白峰”有征程之意；“夕阳穷登攀”中的“穷”字透露出追寻理想的执着，而“夕阳”则喻示着即使年近垂暮也无畏之风骨。这里可看出，李白对理想有着极高的行动力和热忱，既不惧前路遥远险峻，亦不因岁月流逝与年华老去而却步，始终执着求索，非达理想而不止。“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描绘出诗人与太白金星对话，得其助力开启天关，既彰显了李白深信自己将得贵人相助的强烈自信，也隐喻着他坚信前路阻碍必将顺利消解、理想可期的昂扬心境。“愿乘冷风去，直出浮云间”展露出李白追寻自由的襟怀，颇具出世色彩。然末句“一别武功去，何时复更还”却暗含李白对“太白峰”所象征的理想境界之眷恋。虽然他向往隐逸，也随时可以通过壮游来实现，可一旦离开了长安，又怎么建立功名、光明正大地实现功成身退的毕生夙愿

⁴⁵ [唐]李白著，[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页830-831。

呢？这种出世与入世之念的徘徊，正是李白心中的深刻矛盾。而此刻。他仍执意通过入世，来铺就未来出世之途，因而依然积极谋求在长安驻足，寻得理想的出路。

其中“举手可近月，前行若无山”两句，虽常被解读为出世隐逸之思，然置于李白此时的生命语境中细察，实则可视为一份充满行动意志的乐观宣言，恰如赵昌平所言“**透露出一种不无自信的期盼**”⁴⁶。“举手可近月”并非指向逃逸遁世，而是诗人以高度饱满的自信，将“月”视为可凭自身努力趋近乃至触及的目标；而“前行若无山”亦非对现实艰险的选择性无视，而是以其强大的精神意志，主动消解前行中的障碍。

如前所述，开元时期开放的选才制度与道教文化盛行，为李白“天真之月”的生成提供了外部条件。那么，乐观之月则更直接地体现于李白对时代机遇的个人回应，他选择干谒而非科举，选择用诗才而非科考叩开仕途之门。这种选择本身，已是一种高度自信的行动宣言。然而，抵达长安之后，李白所遇并非坦途。初到长安时，李白倍受冷遇，换作一般士人，或许早已灰心离去。然李白却不曾放弃，主动拜谒张说，并由此结识张垪。然而，张垪并未真正援手，反而将李白冷落在玉真公主别馆，使他再度陷入困顿。⁴⁷但李白并未因此而灰心，他写下《玉真仙人词》，试图通过诗才直接叩问玉真公主。他未能通过张垪获得引荐，便转而寻找其他途径。这种“遇挫不退”的行为动机，正是乐观之月的直接产物。李白之所以能在困境中保持行动力，根本原因在于他相信现实中种种障碍最终也会被他强大的精神意志所消解。换言之，乐观之月不仅是一种心态，更是一种行动哲学，它驱动李白不断尝试、不断叩门，即使屡遭拒绝，也绝不放弃对理想的追逐这种从积极干谒到受挫后的再度尝试，鲜明地展现出李白在逆境中执着向上的姿态。

⁴⁶ 赵昌平撰，《李白诗选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页119。

⁴⁷ 安旗著，《李白研究》，页40。

乐观之月同样深刻地影响了李白的自我认知。他不仅相信理想可以企及，更相信自己就是那个有资格企及理想的人。这种自信，在《登太白峰》中以“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的诗句呈现，他并非乞求神仙的帮助，而是与神仙平等对话。这种平等感，折射出李白对自我价值的极高肯定。他不是一个等待被赏识的被动者，而是一个主动展示才华、主动寻求机会的行动者。这种自我认知，使他区别于同时代的大多数士人。在唐代，科举是士人入仕的正途，干谒虽被允许，但干谒者往往以谦卑姿态示人。李白却不同，即便冒着失败的风险，他在干谒中依然保持着高度的自信，甚至锋芒毕露，丝毫不以谦卑自抑换取同情。这种自我形象的建构，正是乐观之月在认知层面的深化。他不仅相信“月”可触及，更相信自己就是那个“攀月”之人。

在诗歌的表达方式上，乐观之月呈现出一种高度主观的诗意夸张。他不仅请求提拔，更以此宣告自己的不凡。《上李邕》中“**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⁴⁸就是此种锋芒最好的体现。这种夸张，不是修辞的技巧，而是乐观心态的自然流露。李白的诗歌之所以呈现出雄奇奔放的风格，根本原因在于他内心对世界抱有积极的期待。他的“月”不是遥远的、冰冷的、不可企及的天体，而是温暖的、亲近的、可以对话的对象。这种对“月”的拟人化、亲密化处理，使他的诗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主体性和情感深度。相比之下，同时代其他诗人笔下的“月”，或寄寓乡愁，或抒发孤高，鲜有如李白这般将“月”视为平等对话者、视为可触及的理想。可以说，乐观之月塑造了李白诗歌中最具辨识度的声音，即那种昂扬、自信、无所畏惧的生命姿态，正是通过“月”这一意象得以最充分地表达。

由此所见，李白在此建构出一个深信理想可及、并愿以全部生命热情付诸实践的“行动者”自我形象。

⁴⁸ [唐]李白著，[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页442-443。

第四章 现实体认中的“月”

尼采曾言：“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笔者认为，此言用以观照李白颇为恰切。然而，若李白果真明晰其生命之所向，又何以在诗中反复流露出茫然彷徨、自我定位之困？这一张力，恰揭示了其精神世界的复杂面向。初入长安后，李白倍受冷遇，未获施展抱负之机，于是一年后即再度启程漫游直至天宝元年（742）方二入长安；然虽得入朝，却仍未受重用，更于天宝三年（744）被“赐金放还”，再度离京漂泊；后于天宝十二年（753）三入长安。⁴⁹若不计其早年出蜀之游，其离开长安后的两次漫游生涯绵延近十载，共计二十载，可以说其人生多半处于行旅之中。而“月”在此时期，则成为他精神上苦苦追寻却始终难以真正靠近的象征。《把酒问月》一诗具体创作时间虽难以考证，然存在观点认为其或作于天宝三年（744）。⁵⁰诗中“人攀明月不可得”⁵¹之叹，即透露出“月”作为可望却难即之理想象征。本章以其漫游时期（30至50岁）为主线，着重探讨青壮年李白在仕途困顿中无奈辗转、却仍在精神上持续求索的生命境遇。

第一节 虚实落差中的叹息之月

本节聚焦李白《长相思》（其一）一诗。此诗一般被认为作于诗人“赐金还山”之后（约744后），通篇虽以相思为表，实亦蕴含深沉的政治寄托，可视为一首含蓄的政治抒情诗。⁵²

⁴⁹ 参见安旗著，《李白研究》，页42-69。

⁵⁰ 詹福瑞等译释，《李白诗全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页738。

⁵¹ [唐]李白著，[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页802-803。

⁵² 裴斐主编，《李白诗歌赏析集》（成都：巴蜀书社出版社，1988），页347。

长相思，在长安。络纬秋啼金井阑，微霜凄凄簟色寒。孤灯不明思欲绝，卷帷望月空长叹。美人如花隔云端，上有青冥之长天，下有绿水之波澜。天长路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长相思，摧心肝。⁵³

“长相思，在长安”直接点明了相思的所在——长安。诚如前文所言，若将此诗视为政治抒情诗，则此时的李白正身处长安之外。他心系仕途，渴望回归那片可以实现理想的热土，却终究不得其门而入。“络纬秋啼金井阑，微霜凄凄簟色寒。孤灯不明思欲绝”等句，以秋虫、微霜、孤灯等意象层层铺陈，无不透露出李白身处异地、夜不能寐的凄凉与孤独。尤其“卷帷望月空长叹”一句，深刻勾勒出诗人于静夜孤室中凝望明月、却唯余长叹的情境。“美人如花隔云端”一句，延续了以“美人”托喻的古典传统。无论是《诗经》中的比兴寄托，还是屈原《楚辞》的香草美人、曹植《美女篇》中以美人喻君子，无不以美人寄寓理想与情怀。由此观之，李白对美人与长安的苦苦相思，应视为其对政治理想的不懈追求⁵⁴。接着，“上有青冥之长天，下有绿水之波澜”暗示着现实中的重重阻碍。这种空间上的“被隔绝感”正是诗人所处的位置，反映了诗人仕途困顿、理想受阻的心理。“天长路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则更进一步强化了此种艰难。末句“长相思，摧心肝”，既道出苦苦追求无果的沉重感，又暗含虽屡遭挫败仍不放弃的执着之意。

开元十八年（730）的干谒虽然失败，李白的诗名却已远播。天宝元年（742），他因道士吴筠之荐，再次来到长安。贺知章读其《蜀道难》，大为惊叹，称之为“谪仙人”，与玉真公主一同向玄宗举荐。玄宗遂召李白入朝，并命其为翰林供奉。此时的李白，似乎终于迎来了“举手可近月”的时刻。然而，此时的政治环境已与开元前期大不相同。晚年的唐玄宗由早期的励精图治转向怠于政事，宠爱杨贵妃，重用李林甫等

⁵³ [唐]李白著，[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页171-172。

⁵⁴ 裴斐主编，《李白诗歌赏析集》，页347。

权臣。据《新唐书·李林甫列传》载，李林甫“居相位凡十九年，固宠市权，蔽欺天子耳目，谏官皆持禄养资，无敢正言者”⁵⁵。更为关键的是，李林甫“疾儒臣以方略积边劳，且大任，欲杜其本，以久己权”，于是劝玄宗“不如用蕃将”⁵⁶，如果说前期关闭“非常之径”是堵塞底层士人的入仕通道，那么“劝用蕃将”则是切断上层文臣的晋升之路。李林甫深知，像张九龄、李适之这样的儒臣，若通过边功获得升迁，便有可能入朝为相，直接威胁其权位；而蕃将出身寒微、不识字，不会对其宰相之位构成威胁。这种排斥文士的人才观，长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玄宗。在这种政治氛围下，有才能者尚且被排抑在外，而李白虽以诗才成功“直抵天子”，却终究被视作为盛世锦上添花的“文学侍从”而非治国安邦的有才之士，其政治理想的实现依然渺茫。面对此种“文学侍从”的处境，李白并非逆来顺受，他曾“使高力士脱靴”。高力士乃玄宗最宠信的宦官，权倾朝野，李白此举既是醉酒后的狂放失态，更是对权贵的公然蔑视，以及对自身“文学侍从”处境的反抗。然而，这种狂放非但未能改变其处境，反而加速了他的被排挤。高力士深以为耻，遂在杨贵妃面前进谗言，称李白在其诗中讽刺她，而张垪等权贵亦因嫉妒屡加构陷。在权贵排挤、君主疏远下，李白自知在朝中已无立足之地，于是便主动向玄宗请辞，玄宗亦知其不可留，于天宝三载（744）“赐金放归”。

从“举手可近月”的自信，到“翰林供奉”的现实，李白亲身经历了一场理想落差的幻灭。他曾相信凭借诗才便可“直抵天子”，事实上他也确实做到了。然而，他很快发现，自己的政治才能在昏君与小人当道的朝局中无从施展。求而不得的痛楚，使其清醒地意识到理想与现实的鸿沟正日益扩大。正如《长相思》中“卷帷望月空长叹”所呈现的那样，“月”的遥远与陌生，正隐喻了这份逐渐失落的理想。他越是积极追寻，

⁵⁵ [宋]欧阳修、宋祁等撰，《新唐书》（奸臣上·李林甫列传），页 6347。

⁵⁶ [宋]欧阳修、宋祁等撰，《新唐书》（奸臣上·李林甫列传），页 6348。

越感受到自身与“月”之间不可跨越的距离；越是试图靠近，越在精神层面体会到更深的疏离与反讽。于是，曾经的乐观之月，渐渐转为叹息之月。

叹息之月作用于李白，首先表现为一种精神上的“搁置”状态。他不再像青年时期那样奋力攀爬，也不像初入长安时那样自信满满。他只是在叹，在做一种无力改变却又无法放下的深沉呼吸。这种叹息，既是对理想落空的无奈接受，也是对自身处境的清醒认知。他清楚地知道，长安已不再属于他，君王不再需要他，权贵仍在排挤他。然而，他又无法彻底割舍那份“申管晏之谈”的抱负，他仍旧只能叹息。

叹息之月亦促使李白将目光从外部世界转向内心。当“月”不再是可以攀爬的对象，它便成为了一个倾听者。李白对着月亮叹息，实际上是在与自己对话。他在叹息中反复咀嚼失败的滋味，在叹息中不断消化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也在叹息中逐渐接受“漂泊者”的身份。他心里仍旧存有那份坚定的理想与抱负，只是碍于局势，无从施展。因此，叹息并非放弃，而是一种缓慢而痛苦的精神调适。

最后，叹息之月成为李白与自我和解的起点。他不再追问“为何不得志”，而是开始思考“如何活下去”。叹息之中，既有对过往的不甘，也有对未来的茫然，但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李白不再以“功成”作为衡量生命价值的唯一标准。他开始学着在漂泊中寻找意义，在孤独中安顿自己。叹息之月，正是这一艰难精神历程的见证。

第二节 孤寂苍凉中的沉思之月

《静夜思》的创作背景虽难以确考，然吴飞推断其或作于天宝十载（751），时值李白北游幽州之际。⁵⁷

床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⁵⁸

⁵⁷ 吴飞，〈《静夜思》考略〉，《大众文艺》2016年第16期，页31。

全诗内容单纯，采用白描手法。“床前看月光”一句，暗示诗人或从白日纷扰中解脱，或夜不能寐，独自凝望床前那一缕月光。“疑是地上霜”以一“疑”字点睛，写出诗人朦胧间的错觉，恍然惊觉时光飞逝，刹那已是深秋。“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呈现出一种连贯的对比，诗人顺着月光抬头望去，只见一轮皎洁明月，瞬间百感交集，低头沉思。思念的或许是故乡，或许是童年，过往种种在刹那间于脑海一一闪过。

学界多将此诗释为“望月思乡”，然“乡”之所指却罕有深论。若“乡”指李白故土蜀地，其自离蜀后便未曾归返，乡情或未必那般浓烈，而其终生为“客”的自我认知，更暗示其精神世界中未必存在一个传统意义上可依恋的“故乡”。诗中之“月”静谧澄明，正是诗人内心所向往的境地。龙新辉指出，这是诗人对精神家园的回归，亦是“思乡”的真正意义所在。⁵⁹

不过，此时李白的心境或许并非纯粹的感怀思乡，而应是各种悲欢、百感交集的精神状态。这既是个人命运的漂泊使然，也是天宝末年社会动荡的时代投射。天宝十载（751）前后，唐朝已由盛转衰。边患频繁，安禄山身兼三镇节度使，拥兵十五万，虎视中原；朝政日益腐败，李林甫虽已死，杨国忠继之，然权贵倾轧仍愈演愈烈。在此种水深火热的局面下，像李白这样曾被排挤出朝的文士，已无可能再次获得重用。此时的李白，既回不去长安，也无法建功立业，更不愿依附权门。在无处可去、无处可归，理想渐生裂痕的苍凉里，最终确认自身作为“漂泊者”宿命，“床前看月光”正是在这种处境下的深夜独白。他不再“叹息”，只是“沉思”，也是天宝末年士人普遍无力感的心理投射。

⁵⁸ [唐]李白著，[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页300。

⁵⁹ 龙新辉，〈李白写“月”诗歌的精神意涵〉，页213。

在李白的壮年时期，叹息之月与沉思之月并非两种截然不同的精神状态，而是同一精神历程的两个阶段。叹息是情绪的宣泄，是求而不得后最直接的情感反应；沉思则是情绪的沉淀，是叹息之后的静默与内省。《静夜思》中的李白，既不是《登太白峰》中那个“举手可近月”的自信青年，也不是《长相思》中那个“卷帷望月空长叹”的焦灼求索者。他不再急切地追问“何时复更还”，也不再痛苦地感叹“梦魂不到关山难”。他只是静静地望着月亮，然后低头。这“低头”之中，有对故乡的思念，有对过往的追忆，有对现状的无奈，也有对前路的茫然。种种情绪交织在一起，无法清晰地区分，也不需要清晰地区分。这也正是《静夜思》的独特之处，它用最简单的语言，承载了最复杂的人生况味。

故此，沉思之月作用于李白，首先表现为精神节奏的放缓。从《登太白峰》中“夕阳穷登攀”、“举手可近月”的急切行动者，到《长相思》中“卷帷望月空长叹”的无奈叹息者，再到《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沉思接纳者。一连串动作的演变，从“攀”的向上力，到“叹”的落差感，再到“望”与“思”的无奈与释然，清晰呈现了从动态到静态、从外放到内敛、从急切到从容的节奏转变。这正是沉思之月最直观的体现。

沉思之月也促使李白从“追问”转向“接纳”。他只是看着月光，接受眼前的一切，接受漂泊、接受孤独、接受理想无法实现的现实。这种接纳不是放弃，而是一种更深沉的与自我和解的方式。他不再与命运对抗，而是在月光中找到了一种安静的共处之道。

沉思之月最后也让李白重新发现了“当下”的意义。早年的他活在未来，“举手可近月”是对未来的期待；中年的他活在过去，“卷帷望月空长叹”是对过去的追悔。而在《静夜思》中，他活在当下。那一刻，没有对未来的焦虑，没有对过去的执念，只

有月光，只有自己，只有此时此刻的沉思。这种“当下”的体验，是漂泊岁月中最珍贵的精神慰藉。它不能改变现实，但可以让李白的精神在现实中暂时安顿下来，也即一种精神安顿。而正是这种精神安顿的凝结，标志着李白从“求索”走向“沉思”，从“对抗”走向“接纳”，从“未来”走向“当下”。

以此观照后来李白加入永王璘麾下之举，可见其“沉思”并非理想的终结，而是另一种层面的延续。他虽在漂泊中确认了自身“无处可归”的命运，也深知机会之渺茫，但当永王征辟的消息传来，他依然毫不犹豫地奔赴。这并非一时冲动，而是因为他从未忘记当年那个“大鹏一日同风起”的自己。青年的底色始终在那里，只是被岁月覆盖上一层又一层的挫折与叹息。沉思让他接纳了漂泊，却没有让他放弃追寻。一旦机会出现，那层覆盖便被掀开，底下的理想依然滚烫。他不是不知道风险，只是比起失败，他更害怕辜负从前的自己。

第五章 结语

本文以李白青壮年时期诗歌中的“月”意象为研究对象，聚焦其在同一生命段落内部因不同精神处境而呈现的层次性深化，探讨了这一深化过程与诗人自我意识演进之间的内在关联。通过对《古朗月行》、《登太白峰》、《长相思》以及《静夜思》等代表性诗作的文本细读，并结合盛唐前中期的社会历史背景分析，本文勾勒出了“月”意象从“天真之月”到“乐观之月”，再到“叹息之月”与“沉思之月”的递进轨迹。这一轨迹并非简单的线性替代，而是同一主体在不同处境下的情感深化与精神调适能力的逐层推进。

在“天真之月”阶段，李白笔下的“月”是“白玉盘”与“瑶台镜”，是尚未负载乡愁与哲思的、纯粹而美好的童年展望。这种天真的生成，与开元前期政治清明、人才选拔开放、道教盛行的时代条件密切相关。“乐观之月”阶段，以《登太白峰》“手可近月”为代表，李白展现出高度昂扬的主体精神。他选择干谒而非科举，以诗才叩开仕途之门，这种选择本身就是一种自信的行动宣言，深刻影响了他的行动、认知与诗歌表达。然而，天宝年间政治生态剧变，玄宗怠政，李林甫专权，排斥文士，李白虽以诗才“直抵天子”，却只沦为“文学侍从”，终被“赐金放还”，从“理想可及”坠入“求而不得”的落差。“叹息之月”由此而生，他在叹息中进行着缓慢而痛苦的精神调适，开始与自我和解。“沉思之月”阶段，以《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为代表，李白展现出更为深沉的精神状态。“月”不再是其攀爬的目标或叹息的对象，而是一个沉默的陪伴者。叹息是情绪的宣泄，沉思是情绪的沉淀。他不再急切追问，只是静静地望着月亮，低头之间，有对故乡的思念、对过往的追忆、对现状的无奈、对前路的茫然，种种情绪交织，无法也不必清晰区分。

从“天真之月”到“沉思之月”的深化轨迹，折射出李白自我意识的丰富、调适与推进。在理想与现实的一次次碰撞中，他逐渐从“理想投射”走向“现实体认”，从“对外追寻”走向“对内安顿”。“月”始终是他精神世界的重要参照。值得注意的是，“天真”、“乐观”、“叹息”、“沉思”四个层次并非线性替代，而是以更为复杂的方式在李白身上共存。当李白举头望月时，那轮明月照见的既是此刻的孤独，也同时照见着早年的天真、壮年的乐观与中年的叹息。天真并未消失，只是被沉淀；乐观并未泯灭，只是被覆盖；叹息并未终结，只是被接纳。“月”早已超越意象本身，成为李白跨越时空的精神挚友。“月”，青年时期是天真的展望、攀爬的目标；壮年时期则是叹息的对象、沉思的伴侣。正如月有阴晴圆缺，这一意象的演变，不仅是李白个人精神历程的诗意呈现，也是盛唐由盛转衰的时代缩影。月亮照见古往今来，也照见李白自己。无论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无论身处何方，“月”始终是他最忠实的倾听者与陪伴者。

本研究尝试做出若干贡献。其一，突破既有研究对李白“月”意象的静态化解读，追踪其在同一生命段落内部因处境不同而产生的层次性深化；其二，将“月”意象的演变与诗人自我意识的演进相勾连，揭示“月”如何作为一种能动的诗学媒介参与并推动李白的自我建构；其三，聚焦青壮年这一关键阶段，弥补了既有研究偏重线性阶段划分、忽视同一阶段内部差异的不足。

然而，本研究仍存在若干局限。首先，由于史料限制，部分诗作的创作时间存在争议，本文主要采信学界较为通行的说法，未能逐一考证。其次，本文聚焦于青壮年时期，对李白晚年，即安史之乱后的“月”意象与自我意识的论述未能充分展开，这一阶段李白经历了流放夜郎、遇赦而归等重大人生转折，其“月”意象或有更为复杂的面相，有待后续研究继续探讨。此外，本文虽尝试运用社会历史分析法，但对天宝末年政治生态与李白个人处境的勾连，仍有进一步深化的空间。

未来研究可在以下方向继续推进：一是将李白的“月”意象与其他唐代诗人，如杜甫、王维、孟浩然等的“月”意象进行比较，以更全面地把握李白在唐代诗歌史上的独特地位；二是从接受史的角度，考察李白“月”意象对后世诗歌的影响；三是结合心理学、哲学等跨学科视角，深入分析“月”意象与李白自我意识之间的复杂关系。

综上所述，李白青壮年时期“月”意象的自我深化，是其精神世界与时代语境交织互动的产物。从天真到乐观，从叹息到沉思，“月”始终陪伴着李白，见证着他的理想、挫折、调适与成长。这一意象的演变，不仅成就了李白诗歌中最为动人的篇章，也为中国古典诗歌的自我书写传统提供了重要参照范式。月光千年不变，而李白笔下的“月”，却因其深刻的主体性与情感深度，永远照亮着后世读者的心灵。

参考文献

专书

1. 安旗著,《李白研究》,北京: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
2. 李长之著,《李白传》,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20。
3. 吕华明、陈安庸、刘金平著,《李太白年谱补正》,北京:中华书局,2012。
4. 裴斐主编,《李白诗歌赏析集》,成都:巴蜀书社出版社,1988。
5. 王先霈主编,《文学批评原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6. 萧涤非等撰,《唐诗鉴赏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
7. 杨海波著,《李白思想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
8. 郁贤皓主编,《中国李白研究》2001-2002年集,合肥:黄山书社,2002。
9.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2。
10. 詹福瑞等译释,《李白诗全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
11.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新著》,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12. 赵昌平撰,《李白诗选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13. 周勋初编,《李白研究》(陈平原主编,《中国学术文存》)),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专书(古籍)

1. [唐]李白著,[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11。
2.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2013。
3. [宋]欧阳修、宋祁等撰,《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2013。
4. [清]黄锡桂编,《李太白年谱》,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

专章

1. 曹化根,〈李白的明月世界〉,郁贤皓主编,《中国李白研究》2001-2002年集,页308-320。合肥:黄山书社,2002。
2. 杨海波著,〈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李白思想的复杂性〉,《李白思想研究》,页219-242。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
3. 袁行霈,〈李白诗歌与盛唐文化〉,页241-254。周勋初编,《李白研究》(陈平原主编,《中国学术文存》),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译著

1. [日]松浦友久著,刘维治、尚永亮、刘崇德译,《李白的客寓意识及其诗思——李白评传》,北京:中华书局,2001。

期刊论文

1. 安相,〈论李白诗歌中月意象的精神内涵〉,《晋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页80-82。
2. 陈燕,〈文学鉴赏中传统诗词意象的现代性转化与接受研究〉,《青年文学家》2025年第30期,页105-107。
3. 陈寅恪,〈李太白氏族之疑问〉,《清华学报》1935年第1期,页153-155。
4. 崔国清,〈文本细读实践起源与范式演进〉,《中国文学批评》2024年第3期,页132-141。
5. 杜晓利,〈富有生命力的文献研究法〉,《上海教育科研》2013年第10期,页1-1。
6. 葛景春,〈李白诗歌与唐代文化精神〉,《河南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页37-39。

7. 李丹丹,〈李白的悲剧人生及诗的明月意象思维特点〉,《贺州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页47-50。
8. 李洲良,〈盛唐时代与李白的浪漫主义精神〉,《求是学刊》1996年第3期,页81-83。
9. 刘飞,〈明月与酒:李白人生定位的困惑〉,《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页114-119。
10. 龙新辉,〈李白写“月”诗歌的精神意涵〉,《湖南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页213-216。
11. 鲁小兰,〈李白诗歌中自我形象及其演变〉,《中原大学》2024年第31期,页45-47。
12. 庞维跃、陈俊文,〈试论李白“月亮”诗中所体现的自我意识〉,《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页53-56。
13. 荣慧华,〈别有天地非人间——李白诗歌中的自我形象〉,《对联》2025年第12期,页72-74。
14. 宋玮,〈李白诗歌中的自我形象与人格魅力〉,《中学语文教学参考》2022年第12期,页89-90。
15. 王强,〈中国古代诗歌中的月意象〉,《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页65-66。
16. 王运熙,〈李白的生活理想和政治理想〉,《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1期,页256-262。
17. 吴飞,〈《静夜思》考略〉,《大众文艺》2016年第16期,页31-33。

学位论文

1. 陈翔,《试论李白开元年间思想与开元士风——兼证李白生平和诗歌中的若干问题》,北京:首都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3。
2. 袁媛,《李白诗文中的“仕”与“隐”》,上海: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3. 贾佳,《心何以安——论李白的人格精神》,郑州:河南大学硕士论文,2009。